



《发现李庄》(全三册),岱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用地图、书桌与信笺重写李庄

□杨早

2004年,岱峻《发现李庄》初版以后,李庄成为了一个大写的抗战文化符号。20年后,新版《发现李庄》挖开了“李庄”的富矿。随着相关史料发掘的日益丰富与完整,“中国李庄”经历了从“故事”向“世界”的转化,不仅能提供更准确、更翔实的历史记录,更推动着李庄书写发生结构性的转变。

“中国李庄”何为?

从宜宾市区往李庄进发,沿江的路边有巨大的雕塑,就是“中国李庄”四个字。这并不是在指射某个旅游区,而是源自现代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寄自海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也能准确送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经常收到寄自‘中国李庄’的学术刊物和书籍”。在李庄开门迎接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学术机构之前,这里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李庄的大门开启之后,这里成为了“中国李庄”,这意味着李庄被写入了地图,同时也写入了历史。

与2004年的初版本一样,2023年版的《发现李庄》仍然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作为“楔子”,但增补了不少人当时的反应。特别引起我关注的增订内容,是史语所考古组的年轻学者夏鼐。夏鼐正从甘肃民勤县出动身外出田野调查,听一个警察说起传闻,日本将无条件投降,半信半疑,“八年之战争,岂便如此作结束乎?今日赴戈壁中旅行,恐须一星期后始能得确实消息”。过了两天,消息更确实了些,他又在日记里回忆“去年桂黔危急,重庆恐慌,余等正在敦煌戈壁中作半个月长途旅行,今日则又在此僻乡工作”。夏鼐的经历是一种时空的反差:无论中国危急或战胜,他的旅行与工作是不会停止的,而他接受的指令来自李庄的史语所。80年后读这些记载,我不禁想:为什么这些学人可以如此笃定?他们所致力的事,无疑对当下的抗战并无明显而直接的用处。然而这些在进行中国彼时学术最前沿研究的学人们,没有困守僻乡新亭对泣,他们四处出击,考察古建筑遗址、西北田野考古、古巴文化字典编纂、调查制盐制糖竹编等民间工艺……这些研究与调查,很明显是指向战后的文化重建与发展。我觉得不能仅仅以“爱国”来解释这些学人对中国未来的充足信心。要让那么多的聪明头脑不舍不弃,不沮不颓,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信心十足,不因战局而或疑或变,需要有一些更实在的理由。依我之见,这种信心的来源,或许就在“中国李庄”这四个字中。

清末以降,中国诸事,便不仅限于中国域内,尤其是民国之后,大留学潮汹涌澎湃,现代学术文化在中国全面建设,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学术文化不仅未因战争而停滞,这不仅仅是几代学人赤心报国的结果,更是中国现代学术牢牢植根于世界学术土壤之中的回报。

用这样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李庄”,则诸多散漫的战时学术线索与细节可以在一个比较新的框架里重新得到书写与整合,也有助于承平时代的读者去理解那一代学人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逻辑。战争对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空间构成了强烈而残酷的挤压,东南半壁的国土沦丧,战前十多年的全力积累毁于一旦,只能步步退让,联大在长沙办不下去,移去昆明,还一度计划迁往四川;史语所与同济在昆明也存不住身,只能沿着长江两岸找寻日军地图上找不到的山坳,林徽因回答费慰梅关于日军进入四川的话:“前面不就是扬子江么”,证明人人皆有不为瓦全之决心,但亦有人抱持“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只要一息尚存,一地尚全,学术文化必须经我之手传承,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不再是一句虚言,这种信心远非“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晚明士大夫心态可比,而是基于中国学人的世界眼光与现代视野。

岱峻的李庄书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徐展开。

从“发现李庄”到“还原李庄”

从2004年初版本的廿余万字,到2023年版《发现李庄》的130余万字,20年间,作者做了哪些增订补益?一言以蔽之,前者注目于“发现李庄”,后者更在意的是“还原李庄”。20年前,李庄尚不为世所知,连李庄当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中央机构怎么会到我们这个偏僻角来?”岱峻对李庄的书写,是被天荒的,目光当然也集中于名气更大、史料更丰的傅斯年、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身上,初版本七章详略不一,力求诉读者一个“完整”的李庄故事,更符合当时的传播目的与公众阅读期待。

20年来,李庄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写的抗战文化符号。而李庄书写,随着《发现李庄》在海内外的影响发酵,史料发掘的日益丰富与完整,经历了从“故事”向“世界”的转化。我曾开玩笑说新版《发现李庄》的丰富是一种“众筹式写作”,即因李庄这个“富矿”一旦被挖开,当年李庄学人后裔、大学与研究机构、历史研究者、民间收藏家等相关信息都会往原点汇集。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梁思永之女梁柏有、陈寅恪之女陈流求……甚至傅斯年的儿子傅仁轨,都通过各种形式与岱峻取得联系,提供帮助。民间藏家如陈晓莲与岱峻素

昧平生,也将陶孟和与社会所的文稿照片按照《发现李庄》书上的地址发给岱峻,信中说:“历史资料也是社会公器,收藏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能够为学术所用。”没有这些“以李庄之名”的各方人士提供的史料与回忆,新版《发现李庄》也无法成立。

史料丰富的意义不仅仅是厚度上的,不仅仅能提供更新、更翔实的历史记录,它更是深度与广度上的,推动着李庄书写发生结构性的转变。近年史学风尚变化,多关注“小人物叙事”与历史细节,过去书里一闪而过的身影,同样有他们不为人知却唏嘘坎坷的命运。刻画,而试图描画出由一个个“小宇宙”组成的李庄世界。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目标变化与史料整合,新版《发现李庄》分成了三卷,每卷的设计侧重迥异,第一卷《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着眼于“李庄与文化抗战”,备述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与李庄的因缘纠葛,不妨将“李庄”视为本卷主角,在接纳这些文化游子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了文化抗战中不可磨灭的名字。第一卷中尤可注意的,是同济大学叙事变得更为丰富。与严整枯燥的研究机构不同,大学的组成、体制、氛围均有所不同。李庄信息闭塞,“长江上每天只有一次宜宾和泸县、重庆之间往返的机动船,途经李庄稍微停留,丢下一捆重庆捎来的报纸”,好有同济在,成立了“青年广播新闻社”,通过无线电与外面世界交流,李庄居民才能第一时间知道抗战胜利的消息。有意思的是,这个广播新闻社还向史语所等单位发起募捐,还答应“当即奉上收据”。这让我们对其时李庄的文化生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读者很能体会到“真相很少纯粹,也决不简单”的缘故。

第二卷《一张中国大书桌》详细书写了李庄学人的各种面相。学人治学,天经地义,更何况有“知识报国”的道德加成。然而,学问不是凭空能做出来的,生活成本、医疗条件、小孩教育、婚姻状况等日常生活的扰攘也是现实存在的。林徽因1943年给朋友陈岱孙的信中谈到“近一年来李庄风气崇尚打架,所闻所见莫不是打架;同事与同事,朋友与朋友,职员与上司,教授与校长,inter-institute(机构之间),inter-family(家庭之间)”。不仅大人“打架”,孩子也会打架,向达的儿子与李方桂的儿子打起来,夫人也争得不可开交,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只好两面作揖。此外,傅斯年为遂歿立作媒,李济连丧爱女,陈寅恪裹足不前,梁思永病重危殆,傅斯年与李济的矛盾、董作宾与游寿的冲突……李庄虽小,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凡此种种,概莫能免。这些人物与往事之所以值得记录,不是因为日常琐碎,而是他们在这样的困苦纷扰之中,仍在坚持小叩大鸣,治学不辍,对他们学问成就的梳理分析亦是题中之义。本卷中,这两类材料交相为用,构成了还原李庄日常的复调。

第三卷《一本战时风雅笺》则是构成全书“复调”的重要一环。此卷包括李庄诸人(无论大小)的诗文、回忆,李庄与外界的往来通信。此卷的存在,无疑让新版《发现李庄》变得更加多元与复杂,许多经作者剪裁拼贴的诗文书函,也能在本卷见见真貌。这一卷可以视为岱峻对自己作者身份的某种放弃与压抑,让读者可以经由这些原生材料来窥见那个时代的身影。

要之,三卷本《发现李庄》尽可能地使用各种材料与手段,使原本较为单线的李庄叙事变得更为杂沓模糊,更近于生活本来的面目。阅读这套书,需要先放下包袱,莫以刻板印象自困,两手空空地接近那段历史、那段生活,才能品出李庄世界的荣耀与悲凉。

“不忘前人史,立志传李庄”

初版《发现李庄》发行一年后,李庄板栗坳乡绅张访琴的外孙女周庸庸老人,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写下《李庄歌》:“李庄风流一朝歇,保存文化有功绩。五十余年人不知,李庄无语空寂寂。前人历史不能忘,岱峻立志传李庄。沧海桑田遗迹散,八方搜集付血汗。数载辛劳路漫漫,发现李庄人惊袍”。新版面世之际,出版社制作的纪念周边折扇上便印了这首《李庄歌》。

岱峻初访李庄是在2000年。20余年来,写文出书固然是良性刺激,相关人士的鼓励与扶助亦很重要,但岱峻自己的坚持与开放、热情与冷静,对于“传李庄”至关重要。史语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曾提到:“他说,许多年来,他将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网站上找得到的史语所文档摘要仔细地看过不知多少遍。所以我们谈话当中,他几乎正确无误地答出了许多事情的日期和细节,包括谁和谁闹不愉快之类的。”“经过他锲而不舍,一层一层抽丝剥茧,才重建这个小镇在抗战时期的许多史事。我觉得陈先生对于寻访史语所旧事的热情已经远远超过我所能想象。”

“传李庄”当然是特指抗战时期哺育供养诸文化机构的李庄,着眼当时李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与外来诸机构人士的契合与冲突。这样的理论说来容易,付诸实践非经者不知其难。且不说史料搜集,最难能的是将李庄放在抗战中国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如果说初版本《发现李庄》是“李庄本位”,是站在李庄与外来机构人士的关系来谋划大篇。那么,三卷本新版《发现李庄》尤其是第二卷《一张中国大书桌》,着眼点在李庄伸展出的枝叶叶构成的战时文化网络,关涉机构制度、战事变化、人际恩怨、个人选择等等。新增章节如《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陈寅恪在李庄)、《庞薰琹与贵州苗艺考察》(居延汉简的劳碌时代),都属于与李庄若即若离(陈寅恪甚至从未踏足李庄),但在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背后指向或在制度之争,或在人事之隔,或在学术之求,林林总总,才描画出以李庄为核心的抗战时期文化生态图景。有些细节点染,未作引申,亦自会心。

岱峻以“学案”形式观照各位学人致力之事业,采用后世学术史研究成果甚伙,未必门门学问精深周到,对于常人难解的学术深井,有很好的“翻译”作用。而关心所集,在于“书桌”而非仅学问。李庄虽小,却摆下了许多张平静的书桌,有忧虑,有困扰,但文脉传统,学行有常,不可不归功于李庄。能够活画出以李庄为中心的文化生态,在于大量流传至今的往来书信。许多细节,若非书信函或提及,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厚尘之下。书信里有时局,有人事,有独见,有酷评,但更让人思味无穷的足溢出信纸的亲友情谊。

1945年秋,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霍荫来访李庄,出面接待的是中央博物院筹备组主任李济。9月20日是战后第一个中秋节,林徽因考虑到李济家有老父,适合家宴,特意两次三番致信,请霍荫来自己家过节,最后一封信写道:“如果客人在此吃饭,与你们的过节方便,两边都极妥当。饭后思成可送他回去,一路黄昏,且可到江边看看热闹,陪同浩之先生一起招呼这洋人也。请千万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决定。”此信极有情,极有味。令人在80年后,仍能想象战后首个中秋的快乐与长江边的热闹,而霍荫的到来,无异为“中国李庄”下了最好的注脚。读到处此,似乎整部《发现李庄》的钩沉描画,苦乐寒暑,都浓缩到了那轮江边的秋月中了。



在战争年代,多少教育机构、文人志士和青年学生在迁徙和流亡中艰难过活。在颠沛和流徙中,在硝烟和炮火中,华夏文化得以弦歌不辍,薪传不绝。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西南联大等,与中国李庄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衣冠南渡、文化抗战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蜗居”秦巴山区的西北联大,也为民族保留下如风中之烛的高等教育火种,更为开启当地民智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期特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姜彩燕,分享与“中国李庄”和“西北联大”话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专著,带我们重新接近那段沉重的历史,走进那段火热的生活。——编者

追寻西北联大的文学足迹

□姜彩燕



编,《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姜彩燕主,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完整勾勒出西北联大在城固的办学历史,帮助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寻觅到西北联大师生们在艰苦岁月里留下的文学足迹。

近年来,学界把1937年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和1938年迁往陕南后易名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及其后的五校分立合作时期,视作一个分而有合、血脉相连的高等教育共同体,统称为“西北联大”。这种思路既有事实的依据,也有历史的基础。由此,西北联大的校史不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难叙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可以连续观照的整体。近年出版的有关西北联大的系列著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这本《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也不例外。

城固:一个抗战文学的地标

翻阅西北联大师生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从作品的标题、内容还是后面的落款,常常会出现一个地名:城固。这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文学理论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的所在地,五校分立后则是西北大学、西北师院和西北工学院的所在地。

城固位于陕南汉中盆地,北凭秦岭,南倚巴山,中通汉水,号为乐城。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故里,也是诸葛亮北伐曹魏时的屯粮之所。在西北联大学子的笔下,城固“群山拱卫,汉江环抱”,古朴而又幽静,仿佛“是一个停滞在十八世纪的古老的小城镇”,然而就是这座小城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中的一个文化中心。在高明所撰的《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西北联大师生翻越秦岭,进驻城固的过程:

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蕃卫之失,耻与非类为伍;或驱车岭路,或徒步荒原;或囊粟涉水,或策杖攀崖,餐风露宿,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疲载奔,以莅止于陝西之城固。喘息未定,父老来集;劳之以酒食,慰之以语言,荫之以宇舍。于是弦歌不复辍响,絳帐于焉重开,问学之士,闻风而至,咸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相与期勉,彬彬乎一时称盛!

战时城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师生们常在“跳蚤、蚊虫、臭虫的三重夹攻”中,“睁着眼睛看破晓的晨光”,然而这里风景如画,古迹众多,堪称乱世中的桃源。1939年,许寿裳在从成都飞往昆明的途中写下“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驻蹕”,记录了在城固的短暂时光。1940年,黎锦熙以“乐城似故乡,三载相凭仗”的诗句,表达了对城固的深厚感情。罗章龙更以“平沙渺渺闻,春水绕巴丘。草树粘天远,烟波抚岸柔”的诗句,描绘了城固境内汉江的迷人景色。

从1938年到1946年,大批青年学子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台湾作家尹雪曼,曾是西北联大校园最活跃的文学组织者,他创办新生社,组织西北文艺笔会,主编《青年月刊》副刊《文艺习作》,发表了大量小说和散文。九叶诗人唐祈在西北联大读的是历史系,但他积极旁听外文系的课程,在盛澄华的指导下,学习里尔克、奥登、冯至的十四行诗,并加以改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和西部风情的“边塞十四行诗”。诗人牛汉曾是西北联大校园里一名“高大、光头、冬天光脚穿草鞋,昂首阔步地走路的大学生”。他钟爱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每天到汉江边大声用俄语朗诵诗,并写下了大量激情四溢的诗篇。

对于大多数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汉中城固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谈起大后方文学,人们更多想到的是西南地区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而谈到大西北文艺,人们主要关注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文艺,处于西南与西北交界处的汉中城固,并不为人所熟知。然而,这里曾留下很多现代作家的足迹,也诞生了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抗战时期不能被遗忘的文学地标之一。

文学活动的多元呈现

《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以黎锦熙、许寿裳所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为序曲,以高明所撰《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作尾声,首尾呼应,完整勾勒出西北联大在城固的办学历史。《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正文部分按文体分类,诗歌部分既有牛汉、唐祈、李满红等人的新诗,也有黎锦熙、许寿裳、罗章龙等人的旧体诗;小说中既选了李紫尼的校园小说《三月江城》,也选了许兴凯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县太爷》;散文部分除了选了尹雪曼、夏照滨等人的抒情小品、纪实散文,还将许寿裳的演讲稿《勾践的精神》、盛澄华的回忆文章《忆纪德》、杨晦的学术论文《曹禺论》以及李战关于新生剧团的演剧日记纳入其中。戏剧部分暂未找到剧本,列为存目,旨在为后来者留下史料查寻的线索。此外,西北联大教师中有一批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如曹靖华、盛澄华、于赓虞、霍自庭、余振、魏荒荒等人,他们的译作对于联大学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也可视作西北联大文学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也将几位翻译家的译作当作一个重要门类编入书中。这种编法既体现西北联大文学活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是对吴俊教授所提出的将旧体文学、俗文学、翻译文学纳入新文学史,以“四维”观点重构新文学史的一种尝试。

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近年来,发掘现代作家的佚文佚简,打捞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追求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向度。西北联大师生中,也有一些曾在当时产生过影响、却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家。比如校园诗人李满红,求学期间曾潜心研读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在《诗创作》《诗垦地》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作,以《失去轨道的火车头》《枷锁》及长诗《枪的故事》受到文坛关注。他不仅诗写得好,还学过武术,会舞剑,而且性格刚强,曾因抗议学校停发贷金而挥刀自刎,幸被救起,后因病早逝,年仅25岁。端木蕻良曾说“他是最有希望的诗人”,“假如给他以充足的时间,他会表现出与马雅可夫斯基近似的锋芒来”。牛汉也认为李满红“当时是全国性的诗人”,后来的很多诗歌选本没有选他是一个遗憾,杨晦也希望“李满红的诗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收录了李满红的几首诗作,也算是弥补了此前的遗憾。

另一位“失踪者”李紫尼是新生剧团的成员,曾积极参与各种演剧活动。大学毕业后担任《北平风》主编。著有散文《城固风光》《战时后方的大学生生活》《我从长安来》等,并出版了小说《青青河畔草》和《三月江城》。《青青河畔草》是一部描写抗战时男女爱情的小说,封面由朱光潜题字,《三月江城》则是一部细致描绘西北联大校园生活的小说。李紫尼的作品文辞优美,感情充沛,对少年时期的从维熙、杨水贤、马嘶等人影响甚大,然而其作品却未受到过研究者的足够关注。他创作的话剧《北京屋檐下》《还乡曲》《落花时节》以及大型歌剧《夜行曲》至今下落不明。他的生平史料也仅在他的散文《夜行曲》留下一鳞半爪。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创作生涯自1945年开始,到1948年就戛然而止了。此后的经历都成了一个谜,有待于我们去慢慢破解。

西北联大教授中还有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日本史研究专家许兴凯。他曾著有《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日本政治经济研究》等著作,有“日本通”之称。1937年,许兴凯教授被任命为河南滑县县长,数月后来西北联大任教,讲授伦理学、经济状况、新闻学研究等课程。他身材矮胖,谈吐风趣,喜欢京剧,还是一位业余中医。他创作热情极高,曾以“老太婆”“老摩登”等笔名发表了大量随笔、散文、小说。1945年,他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章回体小说《县长演义》,后改为《县太爷》,揭露了当时基层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作品中,他不仅纵论官场,分析时事,还夹杂着大量中外名人掌故、诗词、散文、京剧、大鼓,读来妙趣横生,意蕴深厚。据当时人们回忆,这部小说在报刊上连载时,曾红极一时,影响堪比《三毛流浪记》,后来却渐渐隐入尘烟,无人提起。《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将《三月江城》和《县太爷》一并选入,希望对研究现代大学叙事和官场小说的学者有所助。

重新理解抗战文学史的一种可能

过去我们习惯于从地域、社团、流派、文体等条块结构来认识文学史,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西北联大师生们的文学作品时,发现从这一枝蔓上生发出的文学线索,呈现出一种纵横交错的复杂面向。西北联大的教师来自清华、北大、北师大、北平大学等多所高校,联大师生的文学作品在武汉、重庆、成都、桂林、香港等地频频发表,这说明抗战时期虽然交通不便,但西北联大师生的创作热情没有被巴山秦岭所阻挡,始终与其他地域文学息息相通,同频共振。另外,西北联大学生中,既有后来成为延安文艺代表作家的柳青,也有九叶派诗人唐祈、七月派诗人牛汉、东北作家群的李满红,以及台湾作家尹雪曼、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这使我们对抗战文学所包孕的开放性、多元性、流动性多了一些直观的理解,对过去某些相对固化的文学史观念亦有一种纠偏和重构的作用。

李紫尼曾说,战时后方的大学生生活“像一首苦情的诗,有呜咽,有歌唱,更有脉脉的哀情”,西北联大师生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抗战烽火中,面对山河破碎,家国之痛,偏居陕南城固的西北联大师生没有抱怨,没有消沉,而是埋头苦练,笔耕不辍,在荒芜的文学园地上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结下了丰硕的果实,这些都不应被历史所湮没。这本《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集选》的出版,将帮助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寻觅到西北联大师生们在艰苦岁月里留下的文学足迹。